

符号系统与社会再生产

费鲁齐奥·罗西-兰迪著

周劲松译

一、作为一切事物原则的社会再生产

社会再生产是一整套过程，社群或社会因之而得以生存、发展，或至少因之而得以延续。这个概念具有强烈的经济内涵，因为每个人在最低水准上，都必须吃、喝，并保证自己不受恶劣天气侵扰。所以，社会再生产的核心在于对物品的生产，以供即时消费（在最初，是对大自然所提供的东西加以利用）。但是，即使是在原始水平上，生产这些东西的活动也绝对无法完全把社会再生产包括在内。即使是为了满足即时的物质需要，个人也必须结为群体，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启动了其他社会过程；同时，即使是在社会发展的基础阶段，物质性物品本身并不即刻被全部消费，而是在大多数时候，都被放置一旁（被累积起来）供未来的消费之用。这还涉及到同一群体中个体之间的组织形式。所有主要过程都是在社会中进行，并不仅仅是那些直接是生产方面的而已，它们从一开始便一起构成了社会再生产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一）社会再生产，社会实践，以及历史

我们该如何把社会再生产这个概念与其他或多或少指向同一领域的其他一般性概念联系起来呢？我们应该通过对以下两个概念的思考来回答这个问题：社会实践和历史。

如果我们考察某些常见的说法，例如，“人创造历史”¹，“推动历史的诸种力量”之类，我们发现历史处在互补对象这个位置，是人类根据种种方式，并通过重复其自身的各个工具阶段所施行的工作的产物。社会实践这个概念似乎反而主要是指，人作为加入到社群中的成员所做的事情，所起的作用。社会实践被看成是人的实践，人被看作历史主体，看作作用于自然亦作用于自身的施为者。这类说法是（通过对其余部分进行辩证搁置而）单独地对人进行思考，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是脱离自然的。其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社会实践的一个根本性的方面，就是对自然资源滥用和剥削。甚至自然也不能被排斥在社会再生产这个概念之外，因为为了自我再生产，社会必须使用自然为其提供的东西。

根据这些思考（其他的在此且搁一旁），似乎有可能根据一种基于生产劳动基本框架的三分法，把这三个概念归入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现实方面：

社会实践：社会中人所从事的工作。它把人本身和已经被人所改造的自然（过去的历史）作为材料和工具。

社会现实社会再生产：一种巨型设备，即，人所创造和建构的一种工具性组织。该设备由人本身和自然构成，被用作材料和工具。

历史：社会实践产品，通过社会再生产而产生；历史，渐次地，把人和自然理解为产品。

要注意的是，这种三分法来自对社会再生产历史过程的直接切入。它以共时性的方式代表了这个过程中的每个特定瞬间。之前的产品始终已经作为材料和作为新工作的工具而已经在场。按照这种方式，有可能消除“创造历史的人”、“作为超个人力量工具的人”、“作为历史产物的人”以及诸如此类平常说法中明显存在的矛盾。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人通过使用

¹ 显然，诸如此处的表述（指用 man[人，男人]来泛指人，人类。——译者注）可能会被认为有性别偏见。此非作者意图，之所以沿用，是给出其替换说法这种工作会碰到有待圆满解决的种种困难。——作者注

自我来生产和再生产自我——*即使在总体上他们并不知道怎么做到*。如果生产劳动的基本框架得到辩证地运用，许多无用的纷争就可以避免。实际上，每种东西都可以是工作，或者工具、产品；而且可以是新工作发生于其上的材料。

可以用其他各种形式表述。众所周知，三个基本环节——阶级斗争、自然实践领域和科学研究——是在社会实践中得以区别的。社会再生产基本上被以生产、交换和消费来表述。我们后面会回到这一点上来。历史让自己落入过去、现在和未来这种即刻的三分法，其中，现在不断地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做出沟通。后一种三分法的作用之一，是让我们能够在保守与革新、真实与可能、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做出辨别。

就本文目的而言，我们最感兴趣的方面，是作为社会再生产而被表现在这个框架中的工具性方面，只要我们能够将其与社会实践和历史区分开来。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记住，这三个概念，单独地，常常被作为同义词使用，能够被用来囊括，或者至少通过内涵意义表示整个领域。显然，这一个无法脱离另一个而存在，同时，它们所总结的种种关系也始终是即刻性的，因此只有通过使用即刻的共时性切入才可能使之各具特色，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三个概念的确几乎是殚精竭虑地彼此覆盖。所以，采用“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这个组合表达，不仅有强调其工具性方面这一定义作用，而且有使其能够不遗余力地表现总体性——它就是总体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定义作用。

（二）关于社会再生产编目的想法

一旦我们把目光转向作为历史生产机制的社会再生产，试图按其根本脉络对其作总体了解，面对它那无穷的复杂性，我们会为之瞠目，难以呼吸。没有不属于社会再生产的東西。在描述的意义，在原则上，这都是事实。对社会再生产的描述性方法，有可能让我们编制出关于所有主要人类活动的某种巨型编目。这立刻就提出了区分主要活动与次要活动以及建立二者之间关系的问题。要系统地着手这样一种编目，哪怕不限于本文也是不可能的，值得记住的是，这样的编目不得不至少包括以下各组一般性编目，以及对其关系的研究，还有，如果这些编目中这条或那条从所描述的总体性中抽出，那么，关于存在的那种社会类型又该做出何种假设？

1. 从食物开始的维系生存之物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模态。
2. 对社会成员能在其中满意生活的环境的选择、使用或建构。
3. 给孩子传递语言、非语词（non-verbal）及后语词（postverbal）的符号系统、礼仪、民俗、风尚、基本价值观，以及对于社会群体要么是有用、要么仅仅是为其所用到的每种其他符码。
4. 在所有可能的层面上、为所有可能目的的关系所组织的社会成员关系。
5. 关心处于特殊条件下的人群，无论其是否频频出现：婴儿、孕妇、老人、弱者以及非正常者（显然，后者根据关于正常和服从的统治性标准判定）。
6. 赞成、控制、促成或单纯地容忍诸如艺术、音乐、文学或口头传统、哲学或世界观、宗教、科学或准科学研究、不同技术等等其他社会活动的传播和发展。
7. （从事未被列入上表的其他事项。）

编目这一想法中内在的经验—描述因素，可以用作针对种种样式的抽象与偏见以及其他纯理论性建构的矫正器。这些样式和建构，在经历过对现实的完全描述所发起的冲击之后，剩下的那些，将会是真正普泛性的而非普适性的，是建构性的而非简单化的。

（三）作为一切可能范畴所构成矩阵的社会再生产

这里，我们且来看看——哪怕是短短一瞥——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能肯定地断言：一切，在原则上都属于社会再生产。这当然不是唯心主义意义上的。社会再生产不是意识、语言或思想，而是不同方式中的若干物质性过程所构成的总体，它真正发生在地球这个星球上，意识、思想和语言都不过是它的产出之物（这里可以参看 Tr ần duc Thao 1973）。当然，我们并不是坚持认为岩石和树木也都不是“因其自身”、作为“外在之物”，或者——如有些人常说的——“独立于思想”而存在；也不是坚持认为地理的东西不先于生物进化，生物进化不先于社会的存在，按照这种方式，先来的在时间上完全独立于后到的，后来的在时间上完全独立于再后来的。思想与现实之间这一区别本身，根本就无须质疑，与之类似的那些传统的对立与区别，也根本无须质疑。相反，这里所坚持认为的是，任何对象，每个对象，无论其存在的顺序或类型，始终都是在社会再生产之中被个体化、被认定和被采纳。所有这些话语，从其对象的构成开始，都是人类话语，并因此都是属于社会再生产的。关于自然在人之外，人在自身中发现从生到死自然都是一种真正的制约力量，这种相同的认识始终是一种认识，一种看待和解释现实的方式：简单地说，始终都是人在其思维中创造出来的对象。在这一意义上，自然不过是人的发明，没有社会，是无法想象的，并因而逐渐受到生产和制约人的一切的制约。这可以通过关于自然有并继续有多种不同认识这一事实得到说明。即使是在我们寻求“与自然直接的、自发的接触”之时，我们的思维加工，甚至我们的感觉和态度，也都遵循严格的意识形态路径，而这些路径，正是我们所从属的社会为我们建构的。任何理论，无论是关于自然的那些，还是关于人、社会、历史等等的那些，始终都是内在于、而非外在于社会再生产的。社会再生产绝非按照某种理论发生，而是社会再生产生产和使用为自身目的服务的理论。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社会再生产属于基本范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切可能范畴所构成的矩阵。在真实性上，在方法论性质上，这都是一切事物的原则。这条原则并不仅仅，像赛勒斯的水那样*，是对象化了的现实的组成部分而已；它也不是被贬低为自然的整个现实，像种种形式的自然主义中那样；它也不是某种一劳永逸地超越自然的东西，像种种形式的有灵论和唯心主义中那样。“原则”（principle）就是现实本身，是自然和历史因素的综合：人一直以来在建构着的综合，人一直用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有意识的形式在生产和再生产着自身。这种综合为时间和空间中不断的变化所影响。这些变化不仅对于所有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原则上是不可被否定的。要跳出以这种方式变化的该过程是不可能的。“从外部来描述事件”这种想法是没有意义，这充其量是不折不扣的比喻说法。以一种形而上学的和神秘化了的形式，资产阶级思想——以黑格尔为集大成者，已经得出了这一结论。于是，让我们最感兴趣的元素，必然是每种特定情形中决定作为自然和历史因素综合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那些真正力量。

即使是临时性的和非专门性的，所达成的结论也许允许我们用下面这个框架来替代上面那个三分法图表。简单表示如下：

作为工作的社会实践

社会再生产，既包括社会现实，又
包括自然

有着其内部表述的用于历史生产的设备：即，在其
工具方面中来看待的社会再生产本身

作为产品的历史

二、对社会再生产的论述

* 希腊哲学家泰勒斯（Thales，公元前 624?-546?）认为物质由水组成。——译者注

出于对本文普及程度的考虑，显然，如果要对社会再生产说得更多些，采用简化了的标准是必须的。问题在于，在社会再生产的核心找到具有充足内容的某些区别，以免空洞无物，同时，又足够正式，能够独立于社会—历史内容的不断变化进行重新利用。

历史唯物主义的杰出贡献，体现于它发现了这种区别，并继续推动着这些区别的发展。通过采用适当的简化标准而获得的每个区分系统，为了进一步的研究，可以采取模式形式。这里，我们指出三种模式，它们各具特色又相互关联，可能对我们的目标是有用的。它们是：对生产、交换和消费的表述；结构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立；生产、符号系统与意识形态的三分法样式。头两种模式已经属于，并将继续完善于，已经存在的各个学科，第三种模式则是面向创新或集成的一种尝试。我们必须重申，这是一个关于三种模式的问题，它们绝非彼此排斥，而是通过以一种互补的方式投入同一现实的——或者，更应该说，现实本身的——各个方面而彼此协助。

（一）生产、交换和消费

每个具体社会再生产事例的三个主要环节，就是生产、交换和消费。在个人的层面，在集体的层面，都可以把这三个环节彼此分辨出来。吃苹果的人既不买苹果，又不生产苹果。造汽车的人本人既不买汽车，也不用汽车。购买、交换或销售某东西者，须得不是同一货品的生产者或消费者。社会活动的不同复杂方面对应着个人的这些不同位置，个人是这些位置的建制性的发展，包括工厂和企业、分配网络和商店以及消费者。尽管消费最终是在个人行动中实现，但这并不改变以下事实：有专门的社会实现方式，只以公司的方式运作；受益者始终属于其消费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即使在最小的细节方面，由生产和交换所决定的社会群体。

生产、交换和消费不可分割地在一种更为根本的意义上彼此关联，这一点，马克思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的“引言”中就明确加以揭示。它们属于同一总体性；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在脱离另一个的情况下存在。它们的统一是辩证的，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相同的。有了这种强调现象方面多样化的统一性，于是，处理三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实际上，就意味着处理其余的两个。因此，消费者促进了生产与交换，交换者促进了生产与消费，生产者促进了消费与交换。中介开始发挥作用，使得一个之中的行动波及另外两个。这些中介活动可能现实中是缓慢的，并且可能受到种种边沿削弱和现象性激增的影响。然而，这始终是一个关于物质中预先设定了的、不可避免的中介活动的问题。

必须强调，这三个环节并不单指所谓的物质性物品，注定是为人类个体体质的延续为服务的，而且也指所谓文化与精神货品，它们并不即刻地是物质的，譬如语言和每种其他社会建制，价值体系，以及对社会体系中个体的分配和组织。一切都被生产、交换和消费。无物能将自身从被生产、交换和消费中抽离。说得离题一点，按照半神学式的说法：即使世界和天使，也都是被生产出来的。的确，上帝也许能够被定义成不是被生产出来的唯一的存在，是绝对的生产者。神谱学是自相矛盾。自然而然地，所有众所周知的困难、以及众所周知的稀奇古怪，譬如关于上帝是最伟大、最严厉独裁者的看法，以及上帝因为不受任何节制而绝对“恣意妄为”的看法，都是由此而来。

交流的主根就在交换这个环节之中：这里的交流，即语词和非语词信息的交换。正如其他所有一样，信息必须被生产，被消费，以及被交换。因此，在交换的一般性维度中，我们就有了信息的消费、交换和消费（对此，参看“社会再生产的同源性”[“*Omologia della riproduzione sociale*”, Rossi-Landi 1972c]、“语词与物质性符号系统言论集”[“*Articulations in Verbal and Objectual Sign Systems*”, Rossi-Landi 1974e]以及《语言学与经济学》[*Linguistics and Economics*, Rossi-Landi 1975b]第二章)。为其他方面引入同一类型的二度分类是有可能的。在下面的第三种模式中，我们将重新引入符号系统这个概念，并回到信息交换这个环节。

（二）结构与上层建筑

社会再生产中给出了一个根本性对立，它贯穿生产、交换与消费这个三分结构，把社会再生产分成并存的两半。一方面，我们有生产方式，它们又可再分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切社会再生产事例中的基础或者结构。这一基础还包括马里奥·罗西（Mario Rossi）所谓的“共同生活的现有形式以及个人之间的生产协作（譬如家庭关系和工作关系）”（1974: 504；又参 Dhoquoi, 1971: 256；各种观点之间的关系也须得在众多物质关系层面上去发现）。另一方面，我们有所谓的上层建筑，即，一切不以直接方式看待生产方式的东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超然其外，具有相对独立性，“也是”（also）（即使从来不是“只是”[only]）按照自己的规律自我发展。上层建筑以意识形态因素为特色。它包括既非直接的经济—生产的，又非仅仅是存在而已的所有机构，以及所有艺术、文学、科学、宗教和政治活动。

社会生产的这两个一半之间，有着复杂而纠结的关系，不能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者们尽力将这些全都理清楚了。相反，尽管他们对结构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入考察，他们对其如此这般的关系及其实际模态不过略有心得而已。尽管后来的研究者取得了很高水准（譬如 Lukács 1923），后继的阐释者们没有一个对这些关系做出深度厘析，甚至称不上是用充分具有的体系性的方法去研究它们。众所周知，葛兰西（Gramsci）把上层建筑再分为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和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以前者指学校、教会、协会、报刊、政治团体、观点市场，亦即意识形态领域，其中，生产出了建立在所谓民众“自由共识”（free consensus）基础上的领导权；以后者指政府、警察、军队、法庭：国家领域，其中，当缺乏“自由一致”之时，统治的直接实施就会发生。这种再分包括了让我们回到生产关系的元素，同时，似乎又把政治社会从意识形态中抽离出来了（虽然在此语境中，还须参看葛兰西在 1975 年版著作中第 433—434 页以及其他各处的别种论述）。换言之，正如博比奥（Bobbio 1968: 26）所观察到的，葛兰西用的是两种二分法——结构与上层建筑、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来讨论问题，但并未将其坚持到底，达到运用三分法体系的程度。我们将马上回到这一点上来。这里，有几个其他真正切中肯綮的分析例子（譬如 Williams 1973）；但问题还是悬而未决，仍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阐释，关键在于，人们可以大胆提出这样的假设：一个确定的社会对象，就其本身而言，绝不可能是结构或上层建筑，而只有根据思考它的方式，或者根据它被置于其中的那种话语，才有可能。

尽管如此，结构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立似乎无法被忽视。无疑，这触及到某种绝对根本性的东西。尽管有解释上的变化，但在几个一般性的要点上，学界是一致认可的。用一个有趣的悖论来说，确切地说，这是和几个最为重要的要点相关的一个问题，它们对于我们的讨论也最为重要。第一个要点是，每种生产方式都对其上层建筑实施着不断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着首先的重要性。第二个要点，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并切实构成了其主要的共同要素。第三个要点，上层建筑反作用（或者至少可以说，能够反作用）于生产方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在一种持续的、彼此的作用中发展，但这种彼此作用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非对称特征。两个一半之间存在一个循环，但这个循环的节奏和效果并非始终相同。这三个共同认可要点的重要性，可以表示如下：生产方式对所有其他要素所产生的影响的首要性，根植于社会再生产的经济核心（参看上文），并且因此而为其自我延续提供动力。相对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使得革新和革命性意识形态投射成为可能，让把政治放在首位变得合理，并且把我们从历史的机械决定论中解放出来。

（三）生产方式、符号系统与意识形态建制

为了对结构和上层建筑进行有意识的反思，在 1968 年，我觉得似乎引入第三个部分——

或曰维度，是非常有用的，那就是符号系统。起初，这种想法忐忑不安，并带有尝试性，但后来它越来越多成为一种实践性工作。人们常说，交流是“通过”（by means of）符号系统而完成的。根据这一方法，交流和符号系统被当作了分离的实体。符号系统存在着，在那里等待着；交流插了进来，把它们用作了工具。对于插入过程中的零件，甚至给我们提供了某种罗列：发送者与接收者、符号系统、语境、信道，以及启动所有上述元素的交流本身。从我写《作为工作和市场的语言》（*Il linguaggio come lavoro e come mercato*, 1968h, 英语版 1983b）之时起，我已经在很多地方反驳过把一般的符号系统——尤其是语言——当作工具这种看法。这里，我仅仅指出，根据关于任何符号系统的一种经过现实性扩展的看法，这不仅包括符码，以及关于其使用的规则，即人们工作的材料本身就是之前工作的产物（包括作为产物的规则），而且包括被交换的所有信息，它们能够，从原则上在系统本身所启动的话语世界中得到交换。

此外，通过使用另一种现实性扩展，我们看到，每个符号系统还包括操控它的个体和社会群体。所以，也可以说，他们被它所操控。在这一意义上，一个符号系统就是一小片的现实，就是一种形式的社会规划。现在，如前所述，交流根植于交换方面，在生产与消费之间起中介作用。通过把这些思考汇聚在一起，用之前的两种模式来衡量，我们可以说，第三种模式是沟通和综合前两种模式的尝试。所以，社会再生产会在三个层面上发生：生产模式、符号系统和上层建筑。在包括了第二种模式的二分法和第一种模式的三分法的这一三元关系之间，就会有已经通过当前术语部分得到证实的一种密切对应关系，我们将试图在本文中将其揭示出来。

意识形态因素出现在所有三个层面，但它是自我展现，能够——主要是在上层建筑层面，即，人类建制和活动之中——被发现。任何活动，如果要有意义地发生，都需要已经建制化了的结构（作为以超个人符码形式出现的最小元素），这样来考虑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为社会建制概念所吸纳的人类活动这个概念。简单地说，于是我们能够谈起意识形态建制，无需对它们和非意识形态的其他建制做区分，只需强调它们有一种恒定的、的确基本的性质即可。换言之，“意识形态建制”（ideological institutions）这个组合词语是以一种一体性的方式描述现实。如此看来，意识形态建制无非是对上层建筑的种种表述而已。它们与消费方面对应，并证实人必须不断从它们汲取营养这个观点是合理的。被交换所允准的消费“生产”了生产。于是，这个循环得以闭合和自我更新，而其反作用也被认为是合理的。

符号系统，起源于交换方面，在生产模式和意识形态建制之间具有首屈一指的居间地位。不过，它们能够按照它们的顺序被中介。最常见的情形是上面描述过的那种，其中，符号系统通过意识形态建制对生产模式起中介作用，或者，通过前者对后者起中介作用；但是我们也可以假定，并且在现实中发现，所有其他理论上可能的中介情形。

三、社会再生产中的符号系统

现在，我们且来考察被三分为生产、符号系统与意识形态建制的社会再生产的某些方面，我们将特别关注符号系统这个新加入者，我们的考察将从它的在场这一简单事实开始。

（一）非语词符号系统的在场

每个社群的语词符号系统都是多个世纪以来，通过普通说话人和其他更专门的语言使用者（譬如巫师、神父、诗人、作家、技术人员和各种类型的组织者）而发展起来的。按照这种方式，专门的、甚至“理想的”语言得以形成，它们超然于普通言说之外，却受其滋养，与之产生交流。它们的总体性构成了对如此这般的说话人首先的和最为明显的社会—历史制约。不同使用者的特殊语言部分地对应从“子符码（sub-code）”这个术语所理解到的东西。尽管这是一个非常时髦的话题，此刻我们却无须费神关注。

确切地说，我们的重点是，普通言说或各种特殊语言，它们自身都不足以决定其言说

者的世界观，就像支持所谓“语言相对性”（linguistic relativity）流派那些唯心主义者们以前所认定的那样（这里可以参看 Rossi-Landi 1968h）。相反，它们自得其乐，却连决定自身的用法都无能为力，因为它们的存在离不开社群中所运用的其他符号系统：与语词符号系统（即，前语词的[preverbal]、副语词的[paraverbal]和后语词的[postverbal]）相关、仅仅是在严格意义上是非语词的那些，以及由于建立在与构成一个语词符号系统的所发声音无关的符码基础之上而根本算不上语词的那些，或者因为原本就不是声音系统而是其他对象系统而有别于这些的那些。

第二组是目前为止最复杂，也是最不为人知的。我们的整个生活，从其源头开始，就是与非语词符号系统相互交织的。因此，必须摒弃人类中心的、以及从本质上讲——传统上赋予语词符号系统的经典的特权，这样，非语词符号系统才能作为“新的”研究对象出现。即使是对非语词符号系统分类做一个概述，在这里也不是地方。我们将只强调：人们认为，客观性的(objectual)或工具性的(instrumental)非语词符号系统类型是有别于有机的(organic)非语词符号系统的，前者的符码包括在自然中发现的、或人类为了某个目的而生产的物体，而后者的符码，以身体位置和动作的形式、以及各种非语词行为作为形式，是在使用者这个有机体自身中发现的。第三个大类是建制性(institutional)的那类非语词符号系统，它的符码是由关于社会建制的表述构成的。此外，我们还可以在人、动物或其他自然类型的非语词符号系统之间进行区分，尽管显然，一个“唯一的自然的”(only natural)符号系统，这个概念本身马上就能引发其解释者的身份这个微妙问题。

（二）非语词方面对于语词方面产生的影响

从社会起源开始，在复杂性的所有层面上，都有着语词和非语词符号系统之间鲜明的不断而深入的相互影响。不必否认语词符号系统对非语词符号系统的影响，这里，揭示非语词符号系统如何影响到语词符号系统所达到的构成和抽象水平，是十分有用的。我在其他已出版作品中，已经以相当篇幅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探讨，这里，我只简单地使用几个其他作者提供的例子。

我们首先来看“任何东西，如果不首先在社会现实中存在，就无法在意识中存在”这条经典原则。这对作为真实社会关系反映的态度、观念和看法的形成而言是正确的，对之前非语词条件的语词表述来说也是正确的。安布洛吉奥·多尼尼（Ambrogio Donini）更多地关注这些方面的第一个而不是第二个。下面两段经典表述，来自他的著作《宗教史纲要》（*Lineamenti di storia delle religioni*）：

思想—身体(mind-body)二元论……作为人生活方式中所产生分离的反映而出现。新的生产关系使少数人实施的统治变得可能，就此标准来考虑，于是诞生了统治和从属的阶级二元论，诞生了在另一界域、在另一世界以及最终在另一世中满足需求的要求，这些需求是不公正社会条件在现有社会组织中不再答应每个人都能有所保证的……人必须首先经历新的社会结构强加于其日常生活之上的这些限制，阶级中的划分才能提出对精神元素的需要——“精神”（spiritual）是在神学化的和唯心主义哲学赋予这个词的意义上的，与自然、身体，与“物质的”（material）相对（1946: 42-43）。

超级存在（a superior being）这个观点，以及更少用到的人化神祇（personalized divinity）这个观点，在特权群体、主导阶层、社会阶级的优越性在人们之中得到明确之前，不会开始流布（ibid.: 53）。

因此，根据各种各样的反映模态，真正的社会关系会主要出于补偿的目的，以一种投射的方式产生出上层建筑关系和实体。这些上层建筑关系更容易被语词化，而不是成为结构性的东

西，尽管后者也是完全意义上的符号关系。

运用相同的社会现实优先于意识原则，但至少是以不明显的方式对第二个方面而不是第一个方面做出强调（即，从非语词条件过渡到语词条件），乔治·汤普森（George Thompson）（1949, 1955）和阿尔弗雷德·索恩-雷舍尔（Alfred Sohn-Rethel）（1970, 1971）对货币经济（monetary economy）的形成给认识方面带来的结果进行了深入分析。巴门尼德^{*}对一体性存在的看法——此种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在那里”存在、与其内部的差异全然独立地存在，这些内部差异容易被感觉切断、被人力所改变——随这种经济的形成而首先出现于希腊。似乎相同的发展也同步发生在中国和印度。

货币经济在认识方面包含的暗示如下。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金币和银币的价值（value）并不变化，并不“流动”，只要它得到赋予它价值的政治权威保证。只可能发生有关钱币物理存在方面的疑惑：它有受损、磨蚀的可能性。但那时，政治权威会保证用“刚出炉的”新钱币来替代旧钱币。这样，无论钱币实体发生什么，其价值是得到源自威权的社会关系保证的。钱币，了不起的社会发明，是无需考虑其使用价值地使商品藉之以得到交换这个抽象过程中第一个出产物。第二个出产物是钱。金币和银币仍然保有其使用价值。社会支撑的是它们普泛化了的交换价值。每种可能的使用价值在这里都几乎消失殆尽（或者沦为用来擦鼻涕或写便签的支票）。社会支撑是必须施行的社会实践活动。最近几年，似乎瑞士就用贬了值的意大利 100 里拉的钱币来做手表的表盖：通过重新使用其实体而获得比其原有更高的交换价值，这在某种意义上，重新赋予了它们价值。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钱币从流通中消失了的原因。

本质要点在于，商品的交换，和每种交换一样，已经是一个非语词符号系统，它随着以开始由钱币、其后由钱构成的建制，变得越来越复杂，达到越来越高的抽象层次。这个非语词符号系统的结构反映在语言中。按照这种方式，超然体力劳动之外的知识可能性开始形成。抽象、空洞、形式性的概念开始在语言中成形，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有了像伽利略的物理学那样一种关于对象化了的自然的科学的构造。正如如果没有钱币在社会现实中的之前存在，一体性存在这个观念就不可能形成，没有在社会中之前存在的金钱在质上的统一性，其全然缺乏内部差异，也就没有统一的直线运动这种规范。在商品交换中，我们有实体在时空中的运动，物质方面没有变化，有的只是量的变异。简言之，我们有处于运动中的抽象之物。而这正是现代科学的基础。钱，了不起的社会发明，每种可能的交换都能被概括其中，使一种关于量化了的、客观化了的自然的物理科学成为可能（Sohn-Rethel 1971: 118-119; 1972: 98-115, 150-173）。如马克思所说，“见鬼！逻辑范畴竟然真正是从‘我们的商贸’（our commerce）而来！”（1868 年 3 月 25 日致恩格斯的信）

（三）语言在结构—上层建筑循环中的地位

这里，我们能够发现语言在结构—上层建筑循环中的地位这个长期争论问题的阐述（打算），对于这个问题，在斯大林和马尔（Marr）的争辩中，谁都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们将通过对众多相互关联要点的思考做出解答：

1. 语言在结构—上层建筑循环中的地位问题，不能脱离同一循环中所有符号系统的地位问题。让人惊奇的是，这么明显的一个观点并没有得到它应该得到的关注，或者说，要不是语言始终与其他符号系统保持分离这个事实，情况会让人惊奇；
2. 所有生产模式和所有意识形态建制也是符号系统。这是其性质的一个方面。这并未将其说尽，某种近期冒出来的资产阶级“符号泛理性主义”（semiotic panlogism）就是这么认为的，

^{*}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公元前五世纪）以其存在论哲学闻名，他主张存在是一，思想与存在同一。——译者注

这种想法与其说是唯物主义的，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文学的。这种思路的结果，是采取描述形式，把资本拔高到综合一切可能的交换的程度，并且津津乐道脱离了可怕的、受鄙视的工作物质性来考虑的这些交换及其组织。生产模式和意识形态建制“是”（are）符号系统，但是，在辩证的意义上，可以说，生产和消费“是”（are）交换，正如在它们所属的社会总体性中交换“是”（is）生产和消费那样。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辩证统一并不意味着相同。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让不同方面在有组织的讨论中各具特色；

3.符号系统远远达不到拥有基础设施的或下层结构的优势（virtus）这个程度，而且无法简化为仅仅是生产模式或仅仅是意识形态建制。相反，它们一直受到社会再生产每一种影响的作用，从可以被称为人的一种生产开始，它们就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的确，这一生产在更高等动物层面上已经在场。作为旁白，我们必须补充说，这并不是说原始动物层面上，甚至植物世界中，就没有符号和交流；

4.同时，并不与上述要点相矛盾，我们可以肯定，符号系统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这使得它们也根据它们自身的规律，通过它们所构成的总体内部的脉冲和表达，进行发展。在这一意义上，它们和意识形态建制相关；

5.语词符号系统，或者严格意义上的语言，人的物种专属，很快达到如此复杂高度，以至于约束它的那些规律以更加独立于社会再生产其他方面来呈现自我。同样正确的是，语言是教育的主要工具，是产生共识、实施统治的工具。所有这一切会生成约束语言的规律完全独立于社会再生产这种幻象，这种幻象甚至在今天也很平常，在只关注语言的学者们那里尤其如此。因此人们对语言做着白日梦，仿佛现实的其余部分并不存在，并不影响它，或者语言只是用作材料，让这个神奇机器得以运作和展现。

（四）在一切行为的三个层面进行规划

从人群或个人行为的观点看，社会再生产发生在三个层面这一事实意味着行为本身是在同样的三个层面上被规划的。人群和个人学会在三个层面上开展他们的活动：生产模式、符号系统与意识形态建制。这可以按照从最清晰的自觉到最全然的不自觉，到“纯粹生物性的”（merely biological）门槛，在任何阶段发生。在这一点上，这个微妙问题——无意识的、非自愿的学习，人只是消极地服从于学习——就出现了。

行为规划，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对于规划者，被规划者，或者对于二者共同而言，始终而且仅仅发生在总体被决定了的情形中。没有任何其他情形。社会—历史情形使得不可避免地，决定始终是总体的。如果在某一点上，我们发现“还有另一个因素”，我们只能丰富同一种情形：这个新的因素（它新，只是因为之前对它不了解）也，而且不可避免地，对其做出贡献。从这一点看，于是，每个社会行动，原则上，处处发出回响。因此，在三个层面的每一个上，发现自身处在行动更高效的状态的那些社会力量，自我确认。我们称这些为主导力量。这就是，在每一层面上，权力对自身的延续做出规划的方式。

（五）符号系统和共识的生产

符号系统首先是作为共识的生产者和组织者来为权力服务的。葛兰西肯定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显然，他完全是以前符号学的方式对其进行理论思考的，但是，我们很难为此而受到苛责。他写作的时代和条件是个样子。相反，他对语言的观察继续给我们带来启发（评注版的“主题索引”中，3217页整页罗列的是相关参考资料）。必须把各种因素牢记在心，才能把握符号系统作为生产模式和意识形态建制之间主要中介者、作为共识的组织者在社会规划中的重要性。我们将在这里涉及三个主要因素。

首先，有符号系统极为多样和复杂这个因素，不仅是语词的符号系统，而且是非语词的符号系统，这个因素的出现构成了一个新的事实，尤其是在当代，对此事实，无人可以事

先考虑周全。

第二个因素是符号系统的无意识和超个人特征，尤其是非语词符号系统。这里，在这一意义上，“超个人”（superpersonal）是和“个人之下”（hypopersonal）相伴随的：如果个性在本质性部分中把自身等同于个人意识，那么，逃避个人思维把握——或者更应该说，个人种种思维——的那一切，必定把自身置于每个单个个体的意识层次之下。我们必须分辨这两种主要方式，其中，符号系统——尤其是非语词符号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只是知道我们在使用着某种符号系统，但我们根本不知道它是如何起作用的。许多其他情况下，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是在使用一个符号系统。两种情形，但尤其是后一种，强调的是上面所提及的观察：*是符号系统使用我们*。我们自己的共识于是可能在我们看来，不仅是“自发的”，而且是不折不扣“自然的”。仅仅是在几十年前，随着交流理论、新语言学，尤其是符号学的来临——渐次地，它们为全球水平上形成大众交流和日常交换所促进（此二者均为新资本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表现）——符号系统才开始受到学者们关注。如马克思所说，人继续“做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这一事实表明在无意识层面上研究作为规划形式的符号系统的重要性。把之前无意识做的事情带到意识这里，起到了消除神秘化的作用，并且因此而拥护新社会规划的形成。通过这种方式，新资本主义让毁灭其自身的合格工具得以显露、可以获及，就像经典资本主义已经做过的那样。

要记住的第三个因素，是当考察结构和上层建筑、生产模式和意识形态建制之间关系的时候经常会碰到的那些困难。我们的假设是，研究作为中介要素的符号系统，可能有助于解释诸如一种确定的意识形态——无论对某生产模式而言其建制化了的形式如何，无论其发展水平如何——共同在场这类复杂现象。社会从特定生产模式开始是以什么方式建构特定意识形态的？建构适宜的意识形态是以什么方式对生产模式起反作用的？使用社会大脑（a Social Mind）这个有用的抽象——社会大脑以一种超个人的方式对个人在自身中无意识接受的事物进行规划，并试图只通过特定解放工作去发现——我们可以说，社会大脑建构符号系统并迫使它们接受自己，以这种方式在生产和意识形态建制两个层次之间起中介作用。三个层面中共通的东西使传输变得可能；它们之中特殊的东西使得它们每一个只在一个层面上运作，符号系统主要拥有的居间功能使得它们成为整个规划操作的最重要工具。

居间的符号系统通常是生产模式结构的运载者，凭借这些结构渗入意识形态建制，意识形态建制又用于证明这种生产模式是合理的。但是，时间计划周详的政治工作能够使用符号系统，凭借新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渗入主导的生产模式。



（罗西-兰迪与庞齐奥）